

东汉贞夫画像镜赏鉴

Mirror with Image of Zhen Fu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王 牧

2004年在浙江杭州余杭区的星桥镇蜡烛庵东汉砖椁墓中出土一面画像镜(图1)。该镜直径24厘米,半球形大钮,连珠纹纽座。镜背有四乳钉将纹饰分成四区,布局为:一区(图2)立有一妇人,着长袍,挽髻,两手上举,一手举弓,榜题“贞夫”。边侧立有一女,下站有两女(人像较小,估计是为了表示主次关系)。一区(图3)站立一戴冠着袍男子,榜题“宋王”,一侧立有二侍从,榜题“侍郎”,边侧下方置一六博棋盘。一区(图4)中为楼阁建筑。楼阁中有一人。楼阁外一人牵着一马。一区(图5)两人举长剑,怒目圆睁的模样。外区一圈铭文“周是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天下乐无极兮”。边缘兽文带。与此镜伴出的还有汉陶罐、黛板等。

根据此画像镜的榜题和画面,推测与古代民间传说即韩朋与贞夫的爱情故事有关(下简称“韩朋故事”),镜中所题宋王,可能就是宋康王即宋君偃,战国后期宋国的亡国之君。

韩朋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战国时期的宋国,一直以来,它屡屡出现于古代文学作品和各种艺术形式中,且被演绎得十分凄婉动人。如晋干宝的《搜神记》,唐代敦煌变文中的《韩朋赋》,宋元歌谣《青陵台歌》、《乌鹊歌》,元杂剧《列女青陵台》,明万历传奇《韩朋十一义》27出,清代《东周列国志》,甚至越剧《相思树》、川剧《青陵台》等,包括连理枝、相思树等美丽比喻,都与该故事有关。涉足的文学艺术门类丰富,流传时间也几乎涵盖了从故事出现以来的历代,对其津津乐道的也并非仅限于文学家,可见这则民间故事的影响持久而广泛。

早在西汉时期,韩朋故事已著录于文字。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曾发现一批西汉晚期残简。其中释文号为496的残简,正面有“书,而召韩朋问之,韩朋对曰:臣娶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归,妇”27字。据专家考证,即为韩朋的故事片断。该简背面有“百一十二”4字,推测为当年所属册书中之编号,又据文字的叙述方式看,推测“汉简原来的文字应相当长”。马圈所出的这批汉简中的纪年简,时代最早是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最晚在新王莽地皇三年(22年),为判断此简年代提供了可靠依据。

当然在所有的关于韩朋故事的文学作品中,需特别提到《搜神记》与《韩朋赋》。这两个作品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于大众,因而也最为后人熟知和称道。尤其是《搜神记》,为韩朋故事的最早文学作品。在该书的第11卷韩凭妻一章中有如下叙述:“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繆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水大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全文不过三百多字,事情原由言简意赅,而大量笔墨则用于描写韩朋夫妇的生死爱情上,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

与《搜神记》无过细描写故事情节的风格不同,《韩朋赋》共二千多字,整个故事有头有尾,相当完整。它的前半部分的情节是《搜神记》没有的,梗概大致如此:韩朋少小丧父,因远仕宋国,念母孤独,娶妻贞夫。然婚后三日,韩即出游宋国,六秋未归。思夫心切的贞夫致书于朋。“韩朋得书,意感心悲”,欲归却无由,后怀书不慎,将其遗失于殿前。宋王得之,甚爱其言。遣其臣梁伯前去朋家,取贞夫于宫中。赋的后半部分情节与《搜神记》相似。

《韩朋赋》无论是情节或人物刻画都相当的丰富和细腻,也更具生活性和真实性,尤其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贞夫,成功塑造了一个不图权贵、追求至死不渝忠贞爱情的古代列女形象。同时宋王的强夺民女、梁伯的助纣为虐、韩朋的被迫无奈,均有一定的描述和着墨。所以要了解整个韩朋故事的来龙去脉,《韩朋赋》是不得不提及的。关于该赋的成文时间,有学者认为是在晋至萧梁间,也有学者认为是唐宪宗

In 2004, a mirror with image of Zhen Fu was unearthed from a tomb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in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The mirror described the love story between Han Peng and Zhen Fu of the later-Ming Dynasty period. The article says that the mirror was produced in Wuxia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and made where it was unearthed.



图2 东汉贞夫画像镜局部



图3 东汉贞夫画像镜局部



图4 东汉贞夫画像镜局部



图5 东汉贞夫画像镜局部

元和八年(813年)前所作。另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此赋中明确韩朋之妻为贞夫。

虽然在西汉残简、《搜神记》、《韩朋赋》中有关叙述韩朋的故事细节及人名上均有些出入,但因韩朋故事本出自民间传说,故改变成文学作品后有一定的变化与取舍是合理的。至于人名有异,这早有学者进行过相关考证,判定三者都是讲的同一个故事。

韩朋故事虽是文学创作的常用题材,但在铜镜中出现尚属首次。浙江出土画像镜甚多,从类别而言,神仙车马和历史故事类最为典型。其中历史故事类的如吴王、伍子胥画像镜。表现形式一如情节有连贯或关联的连环画,或故事片断,但要读懂镜子上的故事,则需结合文献记载和古代文学作品。所以这也是本文为什么要用较

长的篇幅来谈有关韩朋故事的文学作品的缘由,也是希望借助于它们来读懂镜上每一个画面的故事内涵。文中开头所提到的这面画像镜,贞夫与宋王因有榜题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很显然铜镜中所要突出的是贞夫这个列女形象,这就如同《搜神记》着重想表现的是韩朋与贞夫的凄楚爱情一样,铜镜所要赞扬的是贞夫不为宋王诱惑、不慕荣华富贵、对爱情坚贞不渝的道德情操。这完全符合汉代社会意识形态崇尚和倡导的儒家“忠孝节义”思想及道德准则,这点在吴王、伍子胥画像镜中也有反映,它表现的是有关“忠、义”的题材。可见故事类画像镜宣传主题是相当明确的。

巧的是,最近我有幸在铜镜收藏家处亦看见一面同样题材的画像镜(图6、7)。此镜的画面分四区:一区一妇人着宽袖长



图7 东汉贞夫画像镜局部（孔宪武）



图8 东汉贞夫画像镜（孔宪武）

袍，一手持弓箭，另一手上举后曳作拉弓状，榜题“贞夫”。边侧立有一拱手妇人，下有两拱手侍者。一区居中端坐一拱手神人，戴冠，留须，榜题“东王公”，边侧有一站一坐两侍者。一区与东王公画面隔钮相对，为西王母，拱手坐姿，榜题“西王母”，左右各有侍者。一区为一龙，与贞夫画面相对应。周有一圈铭文：“柏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兮”。贞夫与东王公、西王母、龙等神人神兽共处一镜，可见她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时贞夫的形象不仅广为人们熟知，且作为妇女的榜样在宣传。

关于这两面贞夫画像镜的产地问题，可从铜镜铭文找到出处。两面贞夫镜铭文除表示的工匠姓氏不同外，其余的铭辞几乎一样。在《浙江出土铜镜中》彩图2有东汉车马神仙画像镜，周铭“吴向阳周是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

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周是系周氏，“是”与“氏”古字通。对照余杭所出的贞夫画像镜中铭文字体，与《浙江出土铜镜》中的那面“吴向阳周是”铭文字体十分相近。估计这两面镜很有可能是同一作坊所出的画像镜。又同书的黑白图版34，吴王、伍子胥画像镜，镜铭为“吴向里柏氏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兮”。也有可能与文中介绍的另一面“柏氏”铭贞夫镜是同一作坊的产品。

目前判断铜镜的产地，除出土地点外，铭文也是一个重要依据。从出土数量而言，浙江山阴（今绍兴）、湖北鄂城（武昌）无疑是东汉至三国时期画像镜、神兽镜、龙虎镜的主要产地，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这两地均未发现铸镜工场遗址，因此铭文就成了判断铜镜产地的重要依据与途径。从已著录的东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铭文看，吴县（今江苏苏州）也是当时的铸镜中心，对此已有专家作过相关考证

与论述。同时也认为铭文中的柏氏、周是均为钱塘江北岸浙江吴县制造铜镜的作坊。贞夫画像镜的出土地余杭，在秦代属会稽郡（治所在吴县）。楚汉之际，分会稽郡北部之地置吴郡，郡治在吴县。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阳羨令周嘉上书，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余杭仍属吴郡。直到三国东吴时，余杭还属吴兴郡。另这面贞夫镜出土于东汉砖槨墓中，从浙江境内东汉砖槨墓本身的流行时间来看，时代最早可推到王莽时期，至迟为东汉中期偏早。从伴出的器物分析，也当在这一时段。故此面贞夫画像镜也许可作为吴县所产铜镜的新依据。另一面贞夫镜传为绍兴所出，然铭文中明确有“柏氏作”，在无更新资料的情况下，也可理解为吴县所产。

从已著录的东汉至三国吴故事类画像镜看，仅历史故事一种类型，如吴王、伍子胥画像镜，且只屈指可数的几面，而贞夫画像镜属民间传说类的故事镜，数量也同样稀少，目前所知仅本文介绍的二面，故显得格外珍贵。意义还不仅于此，观察

这两种故事类画像镜，它们的铭辞除工匠姓氏不同外，其余部分几乎一样，均为某某“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天下（后世）乐无极”等。这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铭辞，如《浙江出土铜镜》一书中共有东汉至三国的7面画像镜与5面龙虎镜用的是这类的铭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12面铜镜均出自某一工匠或作坊，姓氏涉及田氏、吕氏、青盖、骆氏（两面画像镜）、石氏（一面画像镜，一面龙虎镜）、吴向阳周氏、吴向里柏氏（一面画像镜、一面龙虎镜），有一面镜为作，显然也是出自某个工匠，而唯一的一面尚方作，估计也是出自某一作坊而非真尚方镜。梅元末治《绍兴古镜聚英》一书中有8面相似镜铭的铜镜，均为画像镜，大部分为神人车马瑞兽镜，铭辞开头全为姓氏，有吕氏、骆氏、田氏（二面）、周仲作、为氏、吴尚里柏氏、周氏作。

就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而言，汉代民族矛盾一直突出，这种辞铭是符合当时民众渴望安定富足的生活心理。但我们会发现，这种铭辞相仿，且大都带有工匠姓氏的镜铭基本出现在博局镜、画像镜中，龙虎镜中也有，而除博局镜外，其它两种镜类在浙江出土特多，也可说是东汉至三国吴会稽郡、吴郡的特产，据此也可认为这是当地流行的一种辞铭。从时段上来看，因余杭所出的这面贞夫故事画像镜是在东汉初年，另在《中国铜镜图典》一书中有一面相仿辞铭的博局镜，其中有“多贺新家民息”句，另《旅顺博物馆藏镜》及《陈介祺藏镜》中有三面（旅顺一面，陈介祺二面）也有相仿辞铭的博局镜，铭文工匠姓氏均为王氏，且铭中均有“新家”，此“新”字很有可能即指王莽时期。而《绍兴古镜聚英》中的东汉周仲作神人龙虎画像镜的铭文为“周仲作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秦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清且明，巧工刻之诚文章”。种种信息都透露了此种镜铭的流行时段当在王莽至东汉初期，进而也可判断故事类画像镜的流行时间也应在这—时段。

我们还可作这样的推测，韩朋与贞夫的民间传说虽产生于战国，但开始广泛流传则可能在汉代，前有西汉的竹简做例证，后有东汉初年贞夫画像镜为依据。因西汉竹简仅剩寥寥数字，很难判断故事的侧面，而东汉画像镜则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画面。尽管目前除贞夫与宋王可明



图8 浙江省上虞出土有建筑形式的画像镜

确外，其余两画面还需揣摩其所要表达的意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汉代人们更看重贞夫的列女形象，而非其凄楚爱情，因而称其为贞夫画像镜似乎更为恰贴。

最后还想特别提及，文章开头介绍的那面贞夫画像镜有建筑形式出现，这也是比较罕见的，尽管汉代的建筑形式在画像石及同时代的陶制品中屡有所见，但在铜镜出现是极少的。根据著录，目前可知在画像镜中出现建筑形式这是第二面，第一面（图8）出土于浙江的上虞。两面画像镜的建筑形式相似，属汉代的重檐楼阁式建筑，楼上前沿有栏干，底层屋内有楼梯。这为我们了解汉代建筑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

（承蒙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正标先生、铜镜收藏家孔震先生提供资料，特此感谢！）

注释：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

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论》，复

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晋干宝撰，汪绍楹校注：《搜神记》，中华书局，1979年。

学者容肇祖在《敦煌本 韩朋赋考》中根据该赋“多有古韵，而音亦属古音”，疑为晋至萧梁间的作品。但张鸿勋在其《说唱艺术奇葩——敦煌变文选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认为，因隋唐时的俗韵也与前代相类似，故仅凭此点不足以作为断代的依据。又根据“抄卷题记仅署甲子而无年号，以敦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至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吐蕃统辖期间写卷、壁画等多署甲子不记年号推之，则题记中的‘癸巳’为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可证本赋为此前时之作。”

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1987年。

王仲殊：《“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考古》，1986年7期。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